



核心阅读

2017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2007年开始，笔者带领课题组从事新的社会阶层研究已有十多年时间。我们围绕新的社会阶层的不同群体开展了大量扎实的调查，积累了十万余个新的社会阶层样本数据，数百万字的访谈资料。十年多历程，我们也总结出一些开展调查研究的经验和心得，供大家参考。

深度入场

现在很多社会调查都采用电话访谈或网络调查，但我们始终坚持研究者必须“入场”。我们到直播间和网络主播互动，到酒吧听流浪歌手唱歌，到工厂和管理技术人员谈发展，到公益平台和社会组织从业者交心。我们与新的社会阶层面对面接触，采取问卷填答、深度访谈、焦点组讨论和场景考察等方式进行调查，这样做虽然费时费力，但事实证明，感性认识是研究问题的起点，没有大量现场感性知识的积累，理性认识难以实现飞跃。要了解新的社会阶层，首先要“入场”，走进他们的圈子，成为“圈内人”，才能揭示出对其而言真正相关的、有影响力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但想入场，谈何容易！新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交往上以专业性较强的“内循环”为主，群体内形成了一个认同度较高的小圈子。在圈子内部，以线下交往为主，经常以沙龙、茶叙、座谈、乐跑、穿越等形式聚会，

增强新时代调查研究的本领

□ 廉 思



抱团取暖，组团取乐。对圈子外部的活动，深度参与不多，对不熟悉的人往往保持一定的距离，很难袒露心扉，人难统、人难聚、人难找。因此，进入新的社会阶层圈子、深入交流沟通思想绝非易事。

在一般的群体调查中，入场的诀窍在于找到关键人物。关键人物的特点是：在圈子内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力。别说他们推荐我们，就是他们仅仅同我们站在一起，都是一个有力的担保与支持，比我们自己解释半天还要管用。我们以往的调查，都会有那么一两个人起到关键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与圈层内的其他人建立更广泛和深入的关系，取得信任。但对于新的社会阶层有些群体而言，找到关键人物则要颇费一番周折。比如自由职业者在自己的空间中生活工作，单枪匹马闯天下，表现出较弱的群体性。缺乏共同的群体利益、普遍认同的群体文化、共同的群体意识、推举的群体代言人，因此找到圈子共同认可的关键人物难度很大。

对于这样的群体，顺利入场要取决于对调研对象的习惯和心理有透彻的理解和精准的把握，要根据具体调研对象自身的特征制定适用于其群体可接受的入场策略。如自由职业者中的独立音乐人大多怀有“彩虹文化”“极客文化”“古着文化”等小众群体文化心理，具有典型的“去商业化”“去娱乐化”“去大众化”的特殊品质，以及拒绝依附的独立品格、卓尔不群的生存方式、对自由的向往以及

对社会底层的人文关怀。我们在入场前，先要对他们的作品有所了解，对作品流派做扎实的功课，尽可能多地搜集相关资料。在入场时，可以到其演出现场，或者是排练现场，聆听完作品后再开始交流，在交流时可以从音乐开始，过渡到生活经历，进而再涉及思想认识，层层递进，循循善诱。新的社会阶层大多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和文化水平，入场的实际效果，最终还是取决于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要想赢得新的社会阶层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尊重，还要和他们在思想上有共鸣，精神上有共振。因此，需要研究者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深度。

共情交流

新的社会阶层职业大多在体制外，流动性强、社会交往与职业高度相关、社会参与意愿和学习愿望强烈、具有较强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但同时又面临着职业瓶颈、流动性大、风险高等诸多困惑，是网络上“中产阶层焦虑”的主要群体。

由于当前人口流动管理、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存在相对滞后问题，导致新的社会阶层产生了一定的相对剥夺感，部分人对体制怀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与我们打交道的时候，难免心存疑虑，心有芥蒂。所以一些人嘴里有两套话语体系，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立足点在哪里，态度是否诚

恳，对方要了解清楚才能如实回答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调查他，他先得调查你，然后再决定是否让你调查他。这个互相调查的过程很微妙，一旦对方发现你的调查态度不那么诚恳，或者你的调查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损害，他们就不愿意接近你，不肯说出真心话。

这些年的调查研究让我们深刻意识到，无论调查问卷设计得多么精美，调查提纲设计得多么严谨，提问方式多么委婉，都无法替代情感在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始终明白，新的社会阶层也是具体的有情感的人，而不是一个个抽象的数据样本，只有长时间用真心去对待他们，才能得到对方坦诚的回应。在与新的社会阶层交往中，一开始，他们可能不接受你的组织，不接受你的观点，但只要你以诚相待，久久为功，驰而不息，他们会先接受你这个人，这是第一步，但确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接受你的个体，才会静下心来听你的观点和意见，才会和你真心实意展开对话。如果连你的个体都不接受，你的观点、你背后代表的组织，他又如何认同？做“蚁族”研究时，很多人问我“你有什么本事”‘蚁族’和父母都不说实话，报喜不报忧，为什么和你无话不谈？”为了研究“蚁族”，我们在北京最大的“蚁族”聚居地——唐家岭——住了两年多时间，我们和“蚁族”一起吃烤串、喝啤酒，大年三十包饺子，“蚁族”把我当做他的亲人，亲人之间有什么话不能说呢？所

以说，做调查研究，要站在调查对象的角度上“共情”。我们不只向他们提问，也回答他们的困惑。我们需要和他们交朋友，听他们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听他们讲对很多具体政策的看法，对民生问题、宗教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一蹴而就，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和毅力，以心换心、心心相映，最后才能心有灵犀。

抽离研判

入场要“深度”，交流要“共情”，但研判则要“抽离”。所谓“抽离”，就要不仅仅听调查对象的一家之言，他们提的意见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有没有政策依据，是否具备实现的条件，不能因为我们和新的社会阶层有了感情，是“一家人”了，就放弃了原则，影响了判断。我们要始终记住，调查研究是一件值得审慎的工作，研究结果将有可能影响到政策的出台和群体的走向。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学术能力、知识体系，同样也是在检测我们的学术道德和社会公心。

当然，“抽离”不是简单的旁观，任何一项调查研究，都不可能完全客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相对科学的方法和公允的态度得出严谨的判断。在自然世界中，客观知识是对物理世界的描述和解释，这种解释是以客观原来说明和预测物理现象的产生或变化。而对社会世界的各种现象则不仅需要客观的因果解释，而且还需要互为主观的知识来理解行动者的目的、动机和理由，即主观的理由解释。调查研究强调研究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而经验事实的把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主观的影响？在调查研究中，经验事实的获得在其研究工具（问卷等）的设计上就表现出研究者的目的性、选择性以及研究者既有的理论和知识的影响与渗透。有关社会的知识是复杂与多样的，因此探寻有关社会的知识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将某一种认知社会的方式普遍化与绝对化不可避免地将陷入困境。因此，要做到相对的“抽离”，就需要“耳闻目睹说”等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对于“旁人”和“关系”的重视、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呼应、大数据和小数据的关联、“生活志”和“口述史”的强调等，以实现调查研究的“大小并重”和“宽厚相间”。

在整个调研的过程中，我们要懂得并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政治、学术和生活这三种语言，对于不同的场景和环境，我们要擅长在这三种语言之间转换。学术话语具有准确严谨的特征，政治话语具有强调立场、突出价值判断的特征，大众话语具有通俗易懂、见文知义的特征。和调查对象沟通，要用生活语言去交流；撰写研究报告，要用政治语言去提炼；撰写研究论文，要用学术语言去总结。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中曾指出：“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

在研判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当各种定量技术的使用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时，研究者对源于自然科学的各种定量方法必须抱有一定的警惕，因为社会毕竟不同于自然，探究有关社会的知识的方式也不是数学推导和模型公式。在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我们的经验是，往往深度访谈和场景观察的效果要好于调查问卷。同样，虽然当下西方社会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套理论体系是在西方工业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理论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是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而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令人欢欣鼓舞的变化的大前提下，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显然不能够有效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现象、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西方有关产阶级的理论对分析当代中国新的社会阶层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实际价值很有限。根本的一条，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新社会阶层的历史演变和群体特征。

随着全球化、网络化、市场化、城镇化的展开，我们党依托的群众基础发生了巨大的位移。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局，如何寻找自身代表的阶级，再一次历史性地摆到了共产党人面前。2017年2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召开，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唯有正确的调查研究，才能有精确的利益分配。寻找到自己新的阶级基础并扩大这个基础，是共产党人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必修课。



专家视点

据势行事 以事成势

□ 赵振宇

时下，各地干部群众都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和本人的实际情况，制定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规划、工作计划和举措，这是真正必须和重要的。但是，在这些讨论和研究中，切忌只顾一地之域、一时之间、一己之利、一事之限而谋事，只从某一具体事情入手，只谈现象而忘了抓住事物的本质。我们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更需要“据势行事，以事成势”，即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研究“事”后的“势”与“势”下的“事”，把握好“事”与“势”之间的辩证关系。

所谓事，说的是人类生活中一切活动和一切社会现象，有时也指单个的活动和表现。而势则是指一切事物力量表现出来的整体特性和趋向，形势反映的是事物发展的当下状况，趋势则是指事物发展的未来动向和走势。它们的性质是由该系统诸事物背后的规律和本质所决定的。我们讨论“事”与“势”，就是研究和把握事物运动、发展、变化过程中个别与整体、具体与抽象、偶然与必然、当下与长远的运动关系，为此，我们要对当下的时代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2017年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之所以特别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在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全局。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的表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认识新时代特征重要性的阐述，是指导我们学习领会十九大报告精神，认清形势、处理“势”与“事”之间关系的纲要和明灯。

“就事论事”，在很多情况下是少不了的，它是我们实现宏大目标的基础。“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但是，仅仅局限于某一小事情而丢失对大局、大势和大事的把握，就可能犯“井底之蛙”“事信功半”的错误。只有在“势”中办事，以事促“势”，以事成“势”，方能够开创势不可挡、势如破竹的新局面，形成借机发力、事半功倍的发展趋势。

“据势行事，以事成势”至少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小事成大事，聚大事成气势，由量变为质变，让我们的基层和具体工作符合十九大报告精神和中央制定的宏大目标，与当前和长远的发展形势相吻合相促进。只有从国家和宏观的大事大势着眼，才能干好地方和微观的小事和具体事。

二是在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事情中选择最能反映本地特色、凸显本地自然优势和人才优势、是大势所趋

必干的事情，集中人力、财力和智慧将其办好，使其在有限的时空中产生势不可挡、势如破竹、势在必行的一种迅猛之力。在“事”与“势”的关系中，这项工作更重要。在做好“势”中之事时，要注意做好那些看似与“势”联系不大不紧的一般事，千万不要因一时的疏忽大意怠慢这些事，使其毁了大事从而影响到当前的形势和发展的趋势。

三是在处理“事”与“势”的关系中特别要注意对时间的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它反映了物质存在和运动发展的一种状态。时间文明讲的是在一定时间里对人们行为准则的要求。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离不开时间，实现中国梦更是如此。我们要把握好当下不断发展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增强时间紧迫感，“据势行事，以事成势”“事势相融”，确保实现中国梦。



笔潭



攻关期与攻坚战的经济思考

□ 尹汉宁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关于经济工作部署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中，说了我们必须面对的攻关期和攻坚战。攻关期是指“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攻坚战是指“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我以为，这是坚持问题导向的使命担当。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克难奋进，扎扎实实地打好攻坚战，真正“跨越关口”。

攻关期或者跨越关口的实质是转换增长动力，真正实现主要由科技创新驱动。攻坚战最难的是既要稳定增长又要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在超越“短缺”的基础上，超越“过剩”。这两个方面既互相联系，又相互区别，无法相互替代。

科技创新驱动要成为推动发展的主要动能，关键在于市场主体的内在需求和创新冲动。调动科研单位及科技人员积极性很有必要，这一直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这方面的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但保障和激发企业科技进步内在需求的制度体系还不太完善。企业原本都有这个需求，但现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不利于企业反映和实现这个需求。比如华为，不上市不通过资本市场反而有利于技术进步，这需要反

思企业制度设计、企业内部股权结构设计的科学性问题。往往由于机制灵活和迫于竞争压力，小企业有很强的创新驱动，但得到金融支持的难度大，得到风投支持就更难了。因此，金融体系和金融产品的设计如何适应，也值得研究，比如要不要专门设立科技银行？要不要在金融服务中有债权与股权联动的制度安排？要不要发展综合金融、公司金融等，应该有思考的空间。

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说过，明斯基时刻未必马上就到，但风险滚存延后的问题值得重视。政府投资平台的构建，相对于过去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是个进步。确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应该包括政府正确充分运用市场的内容。风险滚存延后，为化解和处置重大风险提供了窗口期，处置、救济、限控甚至封堵，可以解决一个阶段的问题，如同当年的信托和城市信用社的处置。应从制度上保障政府充分正确地运用市场，而不会因为政府运用市场而产生和放大风险；当然还包括政府可以有效地弥补市场不足，能够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风险，超越“过剩”。以政府充分正确运用市场为例，如何更好地运用政府平台以外的市场主体，如何从制度安排上解决民间投资进入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和设计。